

《奥斯陆》中佩雷斯式角色的伦理困境及其戏剧呈现

刘欢颜 徐文雅

盐城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盐城，224051；

摘要：本文以罗杰斯的戏剧《奥斯陆》及同名电影为对象，聚焦佩雷斯式角色，围绕“鸽派”私人选择与国家责任，从三重维度剖析其伦理困境及戏剧呈现，探究当代英美戏剧战争叙事伦理指向。分析角色和平理想认知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及内心撕裂，结合秘密谈判等场景，揭示私人调解灵活性与国家权力规范性的矛盾及角色伦理悖论，探讨角色为短期停火让步的妥协与长远利益的博弈，并借角色结局反思“鸽派”选择与国家责任的关系。研究表明，该角色困境是和平理想与现实政治的碰撞，其呈现既具象“鸽派”处境，也提炼出平衡多维度关系的战争叙事伦理启示。

关键词：《奥斯陆》；鸽派；私人选择；国家责任；伦理困境

DOI：10.64216/3080-1516.26.02.095

在当代英美戏剧的战争叙事版图中，伦理冲突始终是穿透历史硝烟、叩击人性深处的核心命题。作为罗杰斯在评论界和商业上最成功的作品，《奥斯陆》聚焦于以定居者殖民主义为根源的长期冲突——巴以冲突。^[1]该剧及其同名改编电影以巴以秘密谈判为叙事核心，将战争与和平的宏大命题聚焦于鸽派角色的私人选择与国家责任的张力之间，为当代英美戏剧的战争叙事伦理研究提供了典型样本。本文以《奥斯陆》中的佩雷斯式角色为研究对象，通过解码其以个人善意撬动历史杠杆的行动逻辑，剖析佩雷斯式角色的伦理困境及其戏剧呈现，探究当代英美戏剧战争叙事的伦理指向。

1 个体良知与国家忠诚的伦理张力

在《奥斯陆》这一作品中，佩雷斯式角色的伦理困境根植于战争创伤对个体道德认知的撕裂，其私人选择与国家责任的冲突恰是在个人利益与良知的博弈中具象化。战争创伤并非直白的暴力复刻，而是渗透于角色潜意识的恐惧与愧疚。正如电影女主角莫娜所说：“你们缠斗撕杀了五十年，母亲跟儿女都因此丧生，问题依旧无解。”^[2]由此可见，战争无论对于哪个阶层的人或是家庭来说，无疑是具有毁灭性的。在戏剧《奥斯陆》中，以色列代表萨维尔与巴勒斯坦代表库赖发生激烈争吵，萨维尔喊道：“在我们国家，我们认为你们就是恐怖分子，天天想着把我们赶尽杀绝。”库赖则回敬道：

“在我们国家，我们认为你们就是茹毛饮血的野人，你们的军队的娱乐活动就是枪杀我们的孩子”。^[2]这些话语不仅是双方矛盾的激烈碰撞，也反映出他们内心深处因战争而产生的对对方的恐惧与仇恨，以及长期以来被

战争创伤所影响的道德认知。

佩雷斯式角色对和平的初始认知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其眼中的和平调解是基于个体的理性对话，即通过战争双方放下仇恨、让步妥协来实现以对话代替杀戮的简单逻辑。“只要让他们坐在一张桌子前，看到彼此不是‘敌人’而是‘人’，流血就能停止。”^[2]这种认知忽略了巴以冲突中宗教、领土、历史仇恨交织的复杂性，也低估了国家利益的刚性，他们并未意识到和平是在现实中依附于国家主权、安全利益等不可退让的政治筹码，这种认知偏差为后续的伦理撕裂埋下伏笔。尽管战争双方始终无法完全妥协退让，但和平谈判已经成为了必然趋势。正如以色列很多人认识到：巴勒斯坦人是不可能通过武力去征服的，与巴勒斯坦人特别是与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组织谈判已经无法回避。^[3]然而萨维尔得知秘密谈判需向以色列政府隐瞒部分让步条件时，深夜独坐办公室内心挣扎：“我在为这个国家的未来铺路，可现在，我像个背叛者——向自己的政府撒谎，向等待安全的国民隐瞒。”^[2]显然，当和平进程进入实操阶段，和平与忠诚义务的不可调和性逐渐凸显，个体良知与集体忠诚的对抗在此达到顶峰。

和平理想与现实政治的复杂性，进一步放大了角色的伦理困境，其内心独白也不断映射出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当巴勒斯坦代表提及难民回归权，而以色列政府明确将此列为不可谈判项时，萨维尔的独白充满无力：“我以为和平是‘各退一步’，可现实是，有些‘步’，国家不允许你退。”^[2]这种困境来源于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平谈判并非单纯的道德对话而是国家利益的博

弈，角色理想中基于良知的调解，在领土、难民等刚性议题面前不堪一击，内心独白中反复出现的挣扎与矛盾，则成为这种冲突的直接戏剧呈现。

2 私人谈判与公共权力的伦理边界

在电影《奥斯陆》中，挪威外交官莫娜与丈夫拉森以非官方私人调解者身份介入巴以冲突，其行动始终游走于私人灵活性与国家规范性之间。这种矛盾在秘密谈判、信息隐瞒与利益交换等戏剧场景中集中爆发，揭示了“鸽派”角色在推进和平进程时面临的伦理悖论：私人调解的效率依赖对程序规范的突破，而国家责任则要求行动必须符合公共利益框架。

非官方私人调解的灵活性与国家权力的规范性从调解启动阶段便形成尖锐矛盾。私人调解的优势在于脱离官方谈判的程序桎梏——无需经过多层审批、不必顾忌公开舆论压力，可在巴以双方间直接传递敏感诉求。“官方谈判要走三个月流程，可加沙的孩子等不了三个月。绕开那些规则，我们才能真正靠近和平。”^[2]这种对灵活性的依赖，却与国家权力对规范性的要求背道而驰。当以色列官方得知谈判未经授权，要求对方立即终止并提交全部记录时，拉森却选择销毁部分涉及领土让步的谈判笔记。莫娜夫妇的调解策略从一开始便绕过国家正式渠道，他们以学术会议为掩护，将巴以代表秘密安排在挪威私人庄园，甚至用36个问题实验快速拉近双方心理距离。当以色列代表萨维尔质问“你们凭什么代表挪威政府”^[2]时，莫娜的沉默暴露了其行动虽基于人道主义信念，却缺乏国家授权的规范性支撑。在公开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把谈判引入秘密状态下进行通常是一个明智的选择。^[4]此处的伦理难题在于私人调解的灵活性本是为突破公共权力的僵化，却因缺乏权力授权而沦为越权行为，角色既需借灵活性推进谈判，又需承担违背国家规范的道德风险，私人行动与公共权力的伦理边界在此变得模糊。

私人行动的戏剧化伦理博弈，在秘密谈判、信息隐瞒、利益交换等核心场景中被推向极致。在原则声明的起草过程中，莫娜夫妇刻意维持信息不对称以推动妥协。例如，他们隐瞒了以色列对犹太定居点问题的强硬立场，同时向巴方暗示以色列可能在难民回归问题上让步。当巴方财政部长用挪威鲑鱼比喻和平的“珍贵而难钓”时，莫娜微笑回应，却未提及协议中埋藏的定时炸弹——对核心争议问题的模糊处理。这种信息操控在伦理层面引

发双重困境：一方面，私人调解者需通过隐瞒部分真相来维持谈判动力；另一方面，国家责任要求行动必须符合公众知情权。“我在拿国家利益做和平的赌注，赢了是和平，输了是罪人”^[2]的感叹，恰是私人行动与公共权力伦理博弈的集中写照。

私人调解的风险与国家责任的冲突，在谈判暴露、公众舆论压力中彻底爆发，导致责任错位的伦理危机。当秘密谈判被媒体曝光后，以色列国内舆论哗然，反对者指责角色“擅自出卖国家利益”^[2]，支持者则呼吁“尊重和平努力”^[2]，而佩雷斯式角色成为了舆论风暴的中心。为打破僵局，莫娜夫妇将谈判场景转化为私人社交空间。他们用苏格兰威士忌、斯堪的纳维亚美食和家庭照片营造非正式氛围，甚至利用双方代表都有女儿名叫“玛雅”的巧合建立情感联结。这种人性牌策略在戏剧高潮中达到顶峰，这一情感攻势迫使对方让步，却也模糊了私人调解与国家利益的边界。

3 短期和平与长期责任的伦理困境

在《奥斯陆》中，佩雷斯式角色的伦理困境还深陷于短期和平与长期责任的纵向矛盾——为达成即时停火，不得不搁置核心争议、让步部分国家利益，却又需承受多方面的道德拷问。这一困境在时间维度上呈现为即时妥协与战略坚守的矛盾，而戏剧通过角色结局的双重设计，揭示了私人选择与国家责任不可调和的张力。

短期停火与长期和平的矛盾，在角色搁置核心争议的妥协中具象化，成为时间维度伦理困境的起点。巴以冲突的核心矛盾——领土划分、难民回归权、耶路撒冷归属等，恰是长期和平的关键支柱，却也最易成为短期停火的阻碍。在秘密谈判的初期，贝林代表以色列政府做出了关键性妥协：允许巴解组织财务大臣库赖以学术代表身份参与会谈，而非直接承认其政治组织合法性。这一策略性让步看似为短期停火创造了条件，实则埋下了长期和平的隐患。更具争议的是对犹太人定居点问题的搁置。当巴方代表阿斯福尔提出将定居点纳入议程时，贝林以政治现实主义为由拒绝讨论，转而聚焦于加沙与杰里科的自治安排。这一选择通过贝林与鹰派军官冈德森的激烈冲突得以外化：冈德森怒斥“我们用领土换取了纸上的和平”^[2]，而贝林则反驳“没有停火，连谈判的纸都不会有”。^[2]这种短期利益优先的逻辑，在现实中直接导致了1995年拉宾遇刺后协议的崩溃。这种抉择的本质是即时生命保护与根本问题解决的伦理优先

级之争，尽管短期停火能直接减少伤亡，却可能因核心争议未决导致冲突复燃。贝林的角色困境在安全承诺与道德责任的冲突中达到高潮。《奥斯陆协议》只是巴以间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粗线条的原则性框架。^[5]当巴方要求以色列承认其民族权利时，贝林私下向莫娜透露：“我可以让步语言，但不能让步生存。”^[2]这种将国家安全置于集体利益之上的选择，在戏剧中通过贝林与妻子托瑞尔的对话被解构为“父亲的自私”——他像保护家庭一样保护国家，却忽视了更广泛的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更具戏剧张力的是贝林与学者蓬达克的辩论。蓬达克主张真正的和平需要承认对方的民族叙事，而贝林则坚持安全是和平的前提。这种对立在现实中对应着1993年协议未解决的难民回归权问题——以色列通过限制回归人数维护了人口结构安全，却牺牲了巴勒斯坦人的集体记忆。戏剧化叙事中的角色结局与“鸽派”寓意，为这一时间维度的伦理困境提供了叙事回应。《奥斯陆协议》是中东和平进程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突破^[6]，但以色列国内仍有大量声音指责其让步过多，巴勒斯坦方也因核心争议未决而对协议不满。贝林虽促成协议签署，却因拉宾遇刺陷入自我怀疑：“我们建了一座沙堡，潮水一来就塌了。”^[2]这种对短期成果的否定，在失败场景中被强化为伦理忏悔。

罗杰斯能将《奥斯陆》成功搬上舞台，也让观众更容易理解：当年那些历史人物为何会相信自己能促成和平。^[7]戏剧的终极启示在于揭示“鸽派”的伦理局限性：私人选择可以推动停火，但无法替代国家责任的战略坚守。当贝林在终场戏中焚烧谈判文件时，火焰的特写镜头象征着短期妥协的虚幻性——纸上的协议可以燃烧，但土地与民族的矛盾永远存在。该戏剧提供了一种看似能带来救赎的简化方案，并巧妙地用真实历史无情地拆解其核心理论，并在揭示这种救赎方案局限性的时刻收尾。^[8]在《奥斯陆》所构建的复杂伦理场域中，佩雷斯式角色犹如站在十字路口的行者，其每一步抉择都深陷个体良知与国家忠诚的激烈撕扯、私人谈判与公共权力的微妙博弈，以及短期和平与长期责任的艰难权衡之中。戏

剧以角色的内心独白与行动抉择为载体，将抽象的伦理矛盾具象化，既揭示了和平进程中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差距，也展现了“鸽派”在夹缝中坚守良知的精神韧性。

参考文献

- [1] Michiels, Laura. “A Sense of Being the Foreign-” : Unlearning Western Privilege in JT Rogers’ s The Overwhelming[J]. Collateral: Online Journal for Cross-Cultural Close Reading, 2020, 26: 1-12.
- [2] Rogers, J. T. Oslo[M]. Theatre Communication Group, 2017.
- [3] 张颖, 葛志强. 《奥斯陆协议》签订以来的巴以冲突[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15(04): 44-47.
- [4] 丁大力. 《奥斯陆协议》签订的谈判学分析[J]. 国际论坛, 2011, 13(05): 7-12+79.
- [5] 李国富, 孙立昕. 奥斯陆协议回顾与展望[J]. 国际问题研究, 1999, (03): 32-36.
- [6] 徐向群. 奥斯陆协议与奥斯陆精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间的和平谈判[J]. 西亚非洲, 1999, (03): 43-48+81.
- [7] Rothstein, Edward. ‘Oslo’ Review: Getting Them in the Room[J]. Wall Street Journal — Online Edition, 2017: 1.
- [8] Soto-Morettini, Donna. History on the Cusp of Myth: J. T. Rogers’ Oslo(Review)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Drama in English, 2018, 6 (2): 315-330.

作者简介：刘欢颜，女，汉族，江苏常州人，本科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徐文雅，女，汉族，江苏盐城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基金项目：2025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当代英美戏剧的战争叙事伦理研究。